

← (上接8版)

功。此铁柱很可能是熔化吐蕃“铁链”改铸而成,学者认为它在洱海以西的点苍山漾濞江一带。开元年间张九龄代玄宗所写的《敕吐蕃赞普书》提到“铁柱书唐九征所作,百姓咸知,何不审之,徒劳往复”,说明铁柱上刻有铭文,而且“百姓咸知”,或为唐蕃之间达成的某种盟约,可惜其内容亦已失传。

另一个著名的铁柱即南诏铁柱,实物现存于云南弥渡县铁柱庙,柱上有阳文楷书题记:“建极十三年岁次壬辰四月庚子朔十四日癸丑建立。”建极为南诏主世隆的年号,建极十三年即公元872年,此铁柱为南诏国自行铸造。其后完成的中兴二年(898)《南诏图传》,描绘了三赅白大首领张乐进求与蒙氏先祖等九人祭铁柱的场景,并在图卷题记与《文字卷》中,提到绘制祭铁柱图的依据为《张氏国史》《铁柱记》等文献,说明祭铁柱是一个与南诏建国史有关的神异故事,而用来祭祀的铁柱一定是洱海地区白蛮中渊源已久的圣物。南诏铁柱与“马援铜柱”毫无关系,而唐九征所立的铁柱很可能有顺应本地风俗的考虑。作为唯一幸存的唐代铁柱,又与溪州铜柱时代十分接近,南诏铁柱的形制便十分值得关注。据最新的测量,南诏铁柱地面以上部分高3.19米,圆柱截面周长1.02米(直径约32.5厘米),地面以上的重量约2100千克。而且南诏铁柱中空,口径约10厘米,地面以上部分柱身有明显的范线,可知它采用内外合范法铸成,共使用了7块外范和一个圆柱型内范,而阳文题记也应在外范内侧阴刻后铸成。

唐代所立的这些金属柱,虽然其制作与树立有着各自不同的情境,但诸如在金属柱上镌刻铭文、用内外合范法制作中空柱等技术元素为它们所共享,形成这一时代超越地域、族群与政治统属的一种技术背景。在此背景下再来观察溪州铜柱,对其形制会有更深的理解。溪州铜柱的形制,最初的描述见于铜柱铭文中所刻的题记:“铜柱高壹丈贰尺,内入地陆尺,重伍仟斤,并石莲花台及下有石赧”。唐及五代的一尺约当30厘米,一丈二尺则为3.6米,入地部分六尺,即1.8米,总长5.4米,各种资料对铜柱长度记录有所出入,但对柱体的记录基本一致:柱有八棱八面,每面宽15厘米,截面宽度(内切圆直径)为36厘米,对角线宽度(外接圆直径)39厘米。溪州铜柱同样是中空的,商承祚根据蔡季襄实地观察描述

道:“柱八觚,中有孔,径约三十五公分,厚约八九公分,孔实乾封泉宝铁钱。”厚约8—9厘米,所指应为中空内壁至外壁间的距离,则可推测其中空部分截面直径约为20厘米。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到,溪州铜柱在形制上最为接近天枢。不仅都是八角柱,甚至其截面边长、直径都是天枢的十分之一,亦即截面面积是天枢的百分之一,而用铜量也是其百分之一。这些数字关系是否只是巧合?天枢存在短短20年即已消失,对于唐后期的人们来说,它也不过是一个文本与记忆中的存在。马希范天策府的学士们是否读到过有关天枢的文献记载?这个问题今天已很难回答,在铜柱的铭文和相关记载中并未提到天枢。

至少有一点溪州铜柱与天枢不同,即铭文中提到的“石莲花台及下有石赧”,两者底座的处理方式不同。“石赧”意义不详,雷家森认为是八方形红色石基座,可备一说。石莲花台则一定是莲花状石基座,这在唐宋建筑的石柱础中十分常见。不过,结合八角柱、刻字、莲花基座等诸多元素来看,溪州铜柱的形制最为接近石经幢。石经幢绝大多数为八角形棱柱,分为幢座、幢身、幢顶三个部分,其上大多刻《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以及造幢记、造幢者题名。作为佛教建筑,经幢的幢座最常见的便是各类莲花造型的底座。经幢出现并极盛于唐代,五代至宋明仍陆续建造,但其质与量都远不如唐代经幢。永淳二年(683),闍宾僧佛陀波利携来《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梵本,并在唐高宗的授权下进行翻译,此后不久经幢便出现了,目前所知最早的石经幢是发现于陕西省富平县的永昌元年(689)八月幢。这一时期,正是武则天逐渐掌握大权并改唐为周的时期,在唐初受到压制的

佛教此时得到积极扶持,陀罗尼经幢藉此在中国流行起来。按照吕博的研究,武则天权力顶峰时期建造的天枢(695年),意在塑造武则天为佛教圣主“转轮王”,利用其上的百官及四夷君长题名来显示对“四天下”的统治,既是一个政治景观,也是一个宗教景观。天枢与石经幢的相似并非偶然,它们出现于同一时期,背后有着相似的政治和宗教背景,更重要的是共享了相似的技术与风尚,某种意义上天枢就是一个放大版与豪华版的金属经幢,虽然其上镌刻的并不是陀罗尼经。

在唐代还出现了铁制的经幢,即天宝四载(745)王袭纲等人在阆州南部县所造的八面铁幢,熔铁铸成,形如石幢,说明此时用金属去制造八角柱并刻字的技术即使在远离两京的南方地区也已具备。铁的熔点和硬度都远高于铜,如不考虑原料成本,用铜制作应更加容易。在溪州铜柱铸造的时期,天枢早已只是书本中的记载,但经幢却遍及天下随处可见,铜柱在设计时参考文献数据中天枢尺寸的可能性虽不能排除,但可以说在实际操作时主要选用经幢作为原型,技术上也具有可行性。另外,铜柱工程的实际负责人,即铭文中署名的铜柱监造者马希广,就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五代史补》记载了马希萼起兵攻入马希广王府中的情境:“希广素奉佛,闻之,计无所出,乃被缁衣,引群僧念‘宝胜如来’,谓之禳灾。顷之,府廨火起,人忽纷扰,犹念诵之声未辍,其憨如此。”笃信密宗佛教的马希广一定非常熟悉陀罗尼经幢,可以推想在铜柱设计时,如果不是他本人想到,工匠们提出的“仿经幢”造型方案也很容易得到他的支持。

对于溪州铜柱而言,存在两种意义上的“模仿”,一是对马援铜柱的模仿,这是符号意

义上的模仿,犹如用典修辞,堂而皇之大力宣扬,然两者间并不一定存在物质形态上的相似性;二是对石经幢和唐代金属柱的模仿,这是实际制作时在设计及工艺上的模仿,是要尽力隐藏的,因为它对前一重模仿构成了否定。各类打着复古旗号的活动,从明堂建造,到礼乐、官制的改革,甚至古文运动莫不如是,表面上是复古,实际上都是用当代的知识和技术解决当代的问题。

## 铜柱为谁而立

到此为止,我们都将溪州铜柱看作是马楚政权制作的纪功柱。然而铭文中又说,“溪之将佐,衔恩向化,请立柱以誓焉”,则“立柱”是应“溪之将佐”的请求,柱的功能是为了进行盟誓,有些学者遂由此引申认为立柱盟誓是溪蛮旧俗。然而前引马希范的那段话,又明确说立柱刻铭的缘由是铭德、纪功、昭恩信、继前烈。如此,铜柱铭文中对于立柱的动机已经出现了矛盾的两说。

铭文记载的铜柱制造过程,或许有助于我们判断以上两说究竟孰是:天福五年正月十九日,彭士愁率五姓酋豪降于马氏,“具件状饮血求誓”,虽然仪式细节不详,但刻在铜柱上的誓词,就是这个仪式上的誓词。到同年五月时,马希范命令李弘皋撰写一篇用于铭德纪功的《记》,并将之刊勒在“标题”上,并未明确此“标题”是铜柱。及至李弘皋的《记》中写道“铜柱堪铭,愿奉祖宗之德”,以及“昭灵铸柱垂英烈……我王铸柱庇黔黎”,说明此时已经有明确的立柱刻铭计划,而且将以马援铜柱为模仿对象。这中间的数日,应即马楚讨论并决定以“铜柱”形式来制作纪念碑的时间。过了两个多月,七月十八日铜柱始铸造完成,又用了20天,至八月九日完成铭文的镌刻。此后又经过四个月,直到十二月二十日才将铜柱在溪州树立起来。由此可见,铜柱的建造和铭刻是一个耗时费力的大工程。溪州之战后用于受降的盟誓在正月已经完成,不可能等到十二月立柱之后再行,“请立柱以誓”不能理解得太实,并非无柱则不能立誓,铜柱最多承担的是以纪念碑的形式保存和展示盟誓的功能,准确说是“请以誓立柱”。那么提出这一要求的“溪之将佐”又是何人?

铜柱铭刻的誓文中,溪州静边都宣誓归顺王化,并承诺不骚扰、劫掠马氏所管诸州,对于王庭与都幕的需求会尽量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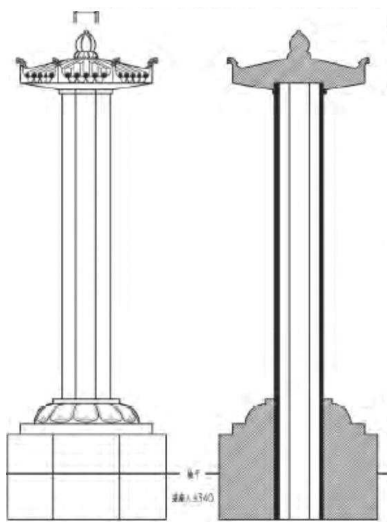
合供应,同时请求仍依旧制“无税课”,仅缴纳一定的“供输”,并且在司法方面由本都裁定。而楚王的回答明确了无科徭,赋租、兵士皆不出本州本都,相当于承认了溪州静边都在财政、司法、军事上的独立地位,这无疑是对溪州权益的极大保障。细读不难注意到,誓文中与楚王盟誓的对象是“溪州静边都”,誓文在申明楚王廷不得干涉溪州的事务之外,还强调了溪州静边都的权力。“都幕采伐土产,不许辄有庇占”,“其五姓主首、州县职掌有罪,本都申上科愆”,五溪不受楚王国干预的自治权是以溪州静边都的统治加强为条件的。战败之后,溪州静边都不但未被削弱,其权力反而得到了承认与增强。请求立柱的“溪之将佐”,正是溪州静边都的“将佐”,那么溪州静边都又是何种势力所主导?

誓文之下的题名,是回答这一问题的最佳材料。题名共19人,为首的便是“静边都指挥使、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太保、使持节、溪州诸军事、守溪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国、陇西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彭士愁”。这是19个题名中唯一提到静边都的。在溪州具有实际权力的使职是静边都指挥使(属官有溪州副使、溪州司马)、开江都指挥使、静寇都指挥使、砂井镇遏使、溪州知后官等;而溪州系统的职事官最重要的是溪州诸军事、溪州刺史,其次为三亭县令、大乡县令,我们暂且称这些为“有效官职”。题名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带有“前某官”的结衔,尤其以上述有效官职为中心构成一个“前任—现任”的人员结构。简单统计可以发现,题名的19人中拥有有效官职的仅有11人,其中彭氏6人,田氏2人,覃氏2人,朱氏1人,龚、向二氏0人。在几个重要职务上,田氏、龚氏都与彭氏构成了前任—现任的关系。可作为参照的是,唐代溪州的两次叛乱,首领分别为覃行章与向子琪,都不姓彭。这充分说明了彭氏与溪州所谓“五姓”之间的权力此消彼长的动态关系。

对于溪州来说,彭氏是一个外来者。彭氏原居住于吉州庐陵郡(今江西吉安),被称为“赤石洞蛮酋”,唐末大乱中彭玕兄弟保聚乡里,被控制江西的钟传用为吉州刺史。906年,钟氏为淮南杨吴所灭,彭玕遂降于湖南马殷,以求保护。909年,彭玕在杨吴压力下无法在江西立足,遂携千余家西入湖南归附马殷,马殷任命彭玕为郴州刺史,并为第二子希范娶其女。910年时,彭玕之弟彭斌



北京云居寺辽代石经幢



溪州铜柱复原图(引自雷家森《溪州铜柱树立与迁徙考论》,《湖南省博物馆馆刊》2013年第10辑)